

天鹿丛书

王维诗选

陈贻焮 选注

空 山 不 见 人
但 闻 人 语 响
景 入 深 林
复 照 青 苔 上

742

1222.742
111

天鹿丛书

王维诗选

陈贻焮 选注

河北教育出版社

天鹿丛书
王维诗选
陈贻焮 选注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5.125 印张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 定价:7.70 元

ISBN 7-5434-3329-X/I · 399

前 言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生于武后长安元年（公元七〇一），卒于肃宗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①。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的高、曾、父三代都做过司马。他家从他父亲开始，迁居于蒲（今山西永济县）。弟王缙，做过代宗的宰相。

^① 王维籍贯有二说：一作太原祁人；一作河东蒲州人。据《旧唐书·王维传》：“王维……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可知太原祁是他的原籍。说是河东蒲州人亦可。王维的生卒年亦有二说：一说生于武后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卒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一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公元七〇一），卒于肃宗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前说卒年系本《旧唐书·王维传》：“（王维）乾元二年七月卒”；

王维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能诗会画，又很懂音乐。少年时代他的名气就很大，他曾经和他的弟弟王缙游历长安、洛阳两都，很受上层社会的欢迎。他二十一岁中进士，做大乐丞，后因伶人舞黄师子的事受到连累^②，谪官济州司库参军。这一时期内他心情很不好，写了许多愤懑不平的诗。其中一些诗像《济上四贤咏》，为埋没的才能抱屈，并有力地抨击封建贵族特权，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现实意义。

王维贬官济州以后的行止不明，现在我们就只知道他大概是在开元二十一二年重新回到长安的。这时他已经有三十多岁了。

王维回到长安重做京官，主要是由于张九龄的提拔。《新唐书·王维传》说：“张九龄执政，擢（维）右拾遗”；从他的《上张令公（即张九龄）》诗中可以知道这是他干谒张九龄的结果。《上张令公》诗说：“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学易思求

又据《新唐书·王维传》谓维享年六十一岁的记载，推出生年。后说系由赵殿成从如下材料中得出：《新唐书·王维传》谓：“（维）上元初卒，年六十一”。据王维《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末所题：“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丞臣王维状进”，知维不卒于上元元年。而上元仅两年（肃宗去上元三年号，止称元年；是年四月楚州献宝，改元年为宝应元年），既不卒于上元元年，则可断定卒于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并从而推知生于长安元年（公元七〇一）。后说为是。

- ② 据《旧唐书·音乐志》：“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鸞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乘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知师子舞为皇帝享宴之乐。《集异记》说：“（维）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即谓此。唐之师子舞与今之狮舞极相似，惟场面特大而已。五方色系：东方青色、南方赤色、中央黄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五方师子即配以此五色。伶人所舞黄师子，只是其中之一，王维或以为不逾制，不冀竟以此获罪。

我，言诗或起予。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可知他在此以前一直是不得志的，要求仕进的心情是迫切的。

王维的干谒张九龄，不能单纯地了解为个人的投靠，实际上他是作为张九龄政治主张的拥护者和支持者而要求参加工作的。

开元二十三年当王维拜右拾遗后又《献始兴公（张九龄在这年封始兴县伯）》诗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食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作者在诗中首先表白自己是有气节的、慎出处的；接着标榜张九龄的正直无私和他“不卖公器”、“为苍生谋”的政迹^①；最后则请求张九龄应从自己择人的公正标准来擢用他，表示他的干谒并非仅仅为了个人的仕进。

张九龄要求搞好国家的郡县地方政治，要求任用贤能，反

① 张九龄在执政前曾上书主张当政者应注意郡县地方官的选择与任用，反对“用牧守之任为斥逐之地”，理由是“六合元元之众，县命于县令，宅生于刺史”，而“毗庶，国家之本”，若“务本之职，乃为好进者所轻，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扰，圣化从此销郁”（见《新唐书·张九龄传》）。此外他还坚决反对阿私，反对朋党，反对以一诗一判取士，反对不以贤而以资授职，尤其反对以名器假人。关于后者，他曾不止一次见诸行动。如开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因张守珪破奚、契丹有功，想用他做宰相，他表示反对。玄宗问他只给以名义而不授实职如何？他说：“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见《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四卷）开元二十四年，他还反对过加给牛仙客尚书职，也不同意给他实封。理由还是“名器不可以假人”，认为牛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又说牛的功绩不过是“实仓库、修器械”，还是边将分内事，不足为功。赏其勤，赐之金帛就可以了。接着他又反对李林甫为相，认为“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同上）由此可见王维说张“不卖公器”、“为苍生谋”并非虚美，且有对其政治见解与态度表示赞同之意。

对朋比阿私，反对名器假人，虽也是“贞观之治”以来“布衣卿相”们的基本政治主张（实际上是属于儒家的），但在当时贵族腐化政治势力日渐抬头的时期，更显出它所特有的极现实的斗争意义。张九龄反对以名器假人，李林甫讥讽他说：“九龄书生，不达大体”（见《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四卷），实质上这正是斗争的尖锐化。张九龄就正是用了“不卖公器、为苍生谋”的政治主张沉重地击中了朋党阿私的李林甫一派反动势力的要害，因此成了李党的眼中钉，终为李党逐出庙堂（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九龄罢知政事，次年四月贬为荆州长史）而后已。张九龄的被逐，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活的结束，同时也是李唐在隋末农民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开明政治的结束。这就无怪乎《资治通鉴》作者编写到这里时要叹息：“（玄宗）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纁、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了。

王维的政治主张和张九龄的接近，而且还受到张的器重和提拔，因此，当张在政治上受到打击，贬为荆州长史时，王维是相当沮丧的，他曾写了一首《寄荆州张丞相》的诗：“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表现了他对张九龄的衷心铭感和深切怀念，吐露出世无知音、不如及时引退之意。张九龄的见逐，对他说来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靠山的丧失，更是他理想中的开明政治的幻灭。

王维自“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的热衷仕进到“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的黯然思退，为时不过短短的三年（这正是张九龄执政的三年），这样急骤的转变，若不从他的政治遭遇着眼，是很难获得中允的解释的。

然而，实际上王维并没有马上退隐。在张九龄贬官荆州的那一年（开元二十五年）秋天，他就因所守监察御史职内的任务，奉命出使塞上，在凉州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中做过一个时期的判官（《使至塞上》、《凉州郊外游望》等诗就是在这次出使期中写成的）^①。从凉州回来后，约于开元二十八九年为殿中侍御史，知南选，至襄阳^②（《汉江临眺》、《晓行巴峡》等诗当是此时之作）。之后，天宝初年做过左补阙，后迁库部郎中。天宝十一载为文部郎中。这年李林甫卒。

从这个简单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王维在李林甫执政期内仍然在做官，而且也多少有所晋升，但是他的内心是矛盾的，是有隐忧的。他有一首《赠从弟司库员外綰》的诗：“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徒闻跃马年，苦无出人智。即事岂徒言，累官非不试；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世意。惠连素清赏，夙语尘外事；欲缓携手

① 注者案：据王维《为崔常侍祭牙门姜将军文》首题：“维大唐开元二十五年岁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骑常侍河西节度副大使摄御史中丞崔公”云云，知王维开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已在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公幕。又据《新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十五年三月……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及吐蕃战于青海，败之”和王维《出塞作》云：“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嫫姚”，知崔副大使即崔希逸；崔希逸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三月战吐蕃获胜，故王维于是年秋奉使出塞宣慰。又据《出塞作》原注云：“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知王维这时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有出使和巡按军戎的职责（见《新唐书·百官志》与《唐会要》卷六十二《出使》条）。为判官事，见《双黄鹤歌送别》原注：“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

② 据王士源《孟浩然集序》，知孟浩然卒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王维至襄阳作诗悼孟，当在是年或第二年孟逝世不久。若为时过久，则诗题必不作《哭孟浩然》了。又《哭孟浩然》诗原注云：“时为殿中侍御史，知南选，至襄阳作。”据此，知王维至襄阳为知南选，时间当在开元二十八九年。

期，流年一何驶！”就是这种心情的表露。既然说：“累官非不试（累次升官，可见并非不被重用）”，那为什么还会“发我遗世意”呢？作者接着就回答，说是因为“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的缘故。

前面说过，自从张九龄给李林甫排挤掉以后，贞观以来的开明政治是结束了，而从此开始了贵族集团的腐化政治和黑暗统治。作为第一个腐化政治集团首领的李林甫是一个极其柔佞多狡的人。他一面深结宦官及妃嫔，私挟皇储；一面对那些“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啗以甘言而阴陷之”（见《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五卷）。当九龄罢知政事后，更是肆无忌惮，曾公开召集谏官们训示：“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璩上书言事，明日即黜为下邳令（见《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四卷）。而其时，王维却正担任谏官的职守，在这种黑暗的政治重压下；何况他还是张九龄的旧人，又怎教他不感到“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怕不合乎时宜而招致政治上的牵累）”呢？而他的《登楼歌》：“舍人下兮青宫，据胡床兮书空；执戟疲于下位，老夫好隐兮墙东”几句，很显然，就是当时“罗钳吉网”^①下冤狱频兴的现实和作者避世远祸的心理的反映。

了解这，我们才会了解他在《终南别业》诗中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在《谒璿上人》诗中说：“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和在上述《赠从弟司库员外綬》诗中说：“少年识事

① 李林甫欲除掉不附己的人，求治狱吏，得吉温、罗希奭；二人皆依林甫之意，锻炼成狱，无人能脱，时人谓之“罗钳吉网”（见《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五卷）。

浅，强学干名利；徒闻跃马年，苦无出人智”这些话时的真实的思想感情。“高人王右丞”之所以“识道”，在我看来，却不能不与他的现实遭遇密切相关。——这当然只是外因，他之所以日趋消极，主要还决定于他本身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王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隐居的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这样：他自从开元二十一二年重回长安到上元二年逝世止，可说并没有正式挂冠归隐过。他一直在做官。他是一面做官一面隐居的。而这样子的隐居，就在李林甫执政的那个时候开始。

案：《终南别业》诗：“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写的是他晚年隐居终南山的生活和心情。这首诗曾为作者同时人芮挺章选入《国秀集》中，题作《初至山中》。《国秀集》中所选开元以来的作品，最迟到天宝三载止。据此，则可断定这首诗当作于天宝三载以前。前面说过，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贬官荆州时，王维曾寄诗九龄，表示自己有退隐之意。但在是年秋，他即奉使出塞。据其《送岐州源长史归》诗原注：“源与余同在崔常侍幕中，时常侍已歿”与《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四卷：“（开元二十六年夏，五月）丙申，以崔希逸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知崔卒于开元二十六年夏五月以后；知崔卒后王维仍在凉州。可见他回长安起码在开元二十六年五月以后。前面说过，开元二十八九年他又知南选至襄阳。中间在京停留不久，似无隐居的可能。那么，我们又可从而进一步确定这首诗的写作时期，也就是作者隐居于终南山的时期是在开元二十八九年（维年四十或四十一岁）以后到天宝三载（维年四十四岁）以前的三四年间。终南山应是王维晚年第一个隐居处。又据《唐诗纪事》“裴迪”条所载，知裴迪、崔兴宗这时已和他做伴了。这一时期他大概正在

做左补阙或库部郎中，而且还写过《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诗，颂扬李林甫说：“上宰无为化，明时太古同”。但是，若从他这种一面做官一面退隐的情况看来，我们很难说他为李林甫所重视，也很难说他的政治态度不是消极的。我们以为李林甫执政时王维屡为郎中，较之右拾遗，官职已由从八品上升到从五品上，不能算不得意（他自己也说：“累官非不试”）。而实际上他是有所不满的。所以当他做库部郎中时，他的同僚苑咸曾嘲笑过他久未迁除，说他：“应同罗汉无名欲，故作冯唐老岁年”（苑咸答王维《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诗）；他答道：“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扬子解嘲徒自遣，冯唐已老复何论（丞相是无私的，只怪自己老朽无能了）”（《重酬苑郎中》），表示自甘落后，不欲腾达。他这些诗句若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四卷中批评李林甫在位时：“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其以巧谄邪险自进者，则超腾不次，自有他蹊”的话相对照，可见其中不无讽意。这里还需要着重补充的是：这苑咸并非寻常人，他就是李林甫依以“然练文法”（见《新唐书·李林甫传》）的亲信秘书。现《全唐文》中所收苑咸文，多是为李林甫所拟答谢玄宗赏赐的文稿。这个李林甫的亲信，当然是知道个中底蕴的。他说王维老年不得志，想非虚语。又，苑咸是李林甫的亲信，王维也不会不知道。苑咸既“有意怜同舍”。那么，对王维说来，该是一条最理想的、循之可“超腾不次”的“他蹊”。然而王维并不走这门径。可见他还是不甘同流合污的。这同时也明显地说明了他和李林甫的关系，以及他为什么一面做官一面又隐居的道理。

《旧唐书·王维传》说：“（维）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王维隐居辋川，

主要当在隐居终南山以后“安史之乱”以前。^①这时他仍在做官

- ① 案：正文中已断定王维开元二十一二年回长安以后最先系隐居于终南山。《旧唐书·王维传》说他“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势必在后。察裴迪《辋口遇雨忆终南山因献绝句》：“积雨晦空曲，平沙灭浮彩。辋水去悠悠，南山复何在”和王维《答裴迪》：“森森寒流广，苍苍秋雨晦。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二诗，亦可证实王维隐居终南山确在隐居辋川之前。又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园，并是亡亲宴坐之余，经行之所。臣往丁凶衅，当即发心：愿为伽蓝，永劫追福。比虽未敢陈请，终日常积恳诚。又属元圣中兴，群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备周行。无以谢生，将何答施。愿献如天之寿，长为率土之君。惟佛之力可凭，施寺之心转切。效微尘于天地，固先国而后家。……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云云，知：一、蓝田山居（即《旧唐书》所谓《蓝田别墅》）系维为其母崔氏奉佛习静所营；二、表请施庄为寺，当在乾元元年安史乱平、维既蒙宥罪、旋复拜官之时（由表文：“又属元圣中兴，群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备周行”可见）。《旧唐书·王维传》谓维“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服阕，拜吏部郎中”。《新唐书·百官志》载天宝十一载改吏部为文部。维居母丧三年、服除、拜吏部郎中，始定于天宝十一载吏部未改文部时，则可推知其母崔氏最迟卒于天宝八载。蓝田山居既系为母生前奉佛所营，则营蓝田山居最迟亦当在天宝八载其母逝世之前（这时李林甫仍在位。李卒于天宝十一载）、隐居终南山之后。案天宝十五载王维陷于安禄山军中，送至洛阳，拘于菩提寺，曾做《口号又示裴迪》诗：“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表示怀念辋川之情（“桃花源”当即指辋川），但其后乱平，凡陷敌官者以六等定罪，维与郑虔、张通等俱囚于宣杨里杨国忠旧宅（见《集异记》。《新唐书·郑虔传》所载亦同，惟“宣杨里”作“宣阳里”），直到乾元元年始蒙宥复官，可见他从天宝十五载陷敌后到乾元元年复官前的两三年间一定没有回过辋川。乾元元年复官到上元二年卒，为时仅四年，且此时他内心愧疚甚深，曾说：“今圣泽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禄，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谢除太子中允表》），因而有责躬荐弟、施寺饭僧之举，那么，就势必不能像以前那样啸傲林泉、悠然自得了。《旧唐书·王维传》谓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可说就是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写照（据维“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陛下圣慈怜愍，煮公粥施之。顷年以来，多有全济。至仁之德，感动上天。故得年谷颇登，逆贼皆灭”，知

(《酬诸公见过》)诗原注即谓：“时官出在辋川庄”。但是，从他这种啸傲林泉、优游自得的神情中，可知他已经做到“遁世无闷”的境地了。他的许多描写自然风景和隐逸生活的优美诗篇，大都是这一时期写作的。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起来，次年六月安禄山陷长安，玄宗奔蜀。这时王维为给事中，扈从玄宗不及，为敌军所获，就服药取痢，伪称瘖疾（口哑不能说话）。安禄山素知其才，遣人将他送到洛阳，强迫他做给事中。据说当时安禄山曾在凝碧池大宴，将所有的梨园乐工召来演唱；乐工们举声便一时泪下。其时王维被拘禁在菩提寺。裴迪来探望，说及这事；王维听了很悲伤，就作了一首七绝，念给裴迪听，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此外还作了一首五绝：“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口号又示裴迪》），抒写他对辋川的怀念和对自由的渴望。至德二载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凡做过伪官的，以六等定罪。而王维则由于他的这首《凝碧池》诗传到行在，得到肃宗的嘉许；又加上他弟弟王缙这时因平乱有功，职位已显，请求削官为兄赎

王维表请施粥在安史乱后表请施寺前后。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事，当在同时。玩味文意，自“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句起至“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句止，自为一段，说即是维复官后至卒前三四年之间的生活写照，似与情实相符），与同传描写他以前在辋川时，“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的生活截然不同。乾元元年维复拜给事中时，杜甫曾至蓝田访崔兴宗、王维，未遇维，为“崔氏东山草堂”诗，末云：“何事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亦可见维此时多不在辋川。根据以上的分析，可判明：王维与裴迪隐居辋川，主要在天宝十五载安禄山陷长安以前；《辋川集》及其他在辋川所写的绝大部分诗歌，也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罪，特别得到宽恕，仅只降为太子中允。后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其后复拜给事中。乾元二年转尚书右丞。虽然如此，王维经过这样的挫折，感到再做官也没什么意思，就上表责躬，乞归田里；并极力推荐他的弟弟王缙，求肃宗将王缙从蜀州刺史任上调回朝廷，说：“臣之五短，弟之五长；加以有功，又能为政。顾臣谬官华省，而弟远守方州。外愧妨贤，内惭比义。……伏乞尽削臣官，放归田里；赐弟散职，令在朝廷。”（《责躬荐弟表》）过了许久肃宗才接受他的请求，于上元二年将王缙调回朝廷，授左散骑常侍（后来王缙竟做过代宗的宰相，但政绩甚劣）。同年，王维卒，年六十一岁。

王维、王缙、母崔氏皆信奉佛教。母亡，王维曾表请施辋川庄第为佛寺^①。王维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据《责躬荐弟表》说：“臣又逼近悬车，朝暮入地。阒然孤独，迥无子孙”，可知他没有子嗣。

大体说来，王维从因伶人舞黄师子事受累贬官后到开元二十一年重回长安做京官以前和在张九龄执政期内（后简称前期），接近当时比较进步的政治力量，思想感情中也的确存在着进步和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就是他许多诗歌带有人民性与积极意义的根据。但是，我们却不能就因此过分地对他，尤其对他晚年给以夸大的评价。自开元二十四五年张九龄罢知政事、贬官荆州以后（后简称后期），王维是消极的、妥协的。他不同意不良政治倾向，却不敢起来斗争；不同意李林甫，却不敢不在他下面做官，不敢不去歌功颂德。我们不认为他甘愿叛变，甘愿去做安禄山的官，但他也不敢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反

^① 王维所施之寺，即清源寺；一名鹿苑寺，或鹿原寺。王右丞祠、王维及其母崔氏墓，俱在此，见《陕西志》、《长安志》。

抗。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不官不隐、亦官亦隐的“高人”，与统治者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始终为统治者所不忍弃。所有这些不好的政治表现，我们不应只看作为佛学对他所产生的坏影响；相反，他的学佛，也应看做为他思想意识中妥协一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王维对自己妥协圆滑的一面并不是不自觉的；而且他还有自己的理论。他在六十来岁写的《与魏居士书》中说：“古之高者曰许由，挂瓢于树，风吹瓢，恶而去之。闻尧让，临水而洗其耳。耳非驻声之地，声无染耳之迹，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入道者之门欤？降及嵇康，亦云：“顿缨狂顾，逾思长林而忆丰草。”顿缨狂顾，岂与俛受维繫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至于他自己的主张却是这样：“‘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仁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这一席话，足以说明他晚年为人处世的圆通态度。

这种消极态度当然是很不好的，是政治立场不坚定、缺乏斗争性的表现。尽管这样，而他后期，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是始终没有和李林甫之流同流合污；他这一时期的不少诗歌，还是流露出对当时现实的情绪，这都是应该指出而加以肯定的。

二

初唐以来，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一般地主要求参预政权，发展了科举制度，相对地打破了贵族门阀把持政治的局面。但是，亲近、贵戚的擅权和封建官爵的荫袭等不合理的事，还是严重存在；而一般人才的任用，还是有极大的限制性。玄宗开元末到安史之乱前，李林甫、杨国忠当权时的跋扈骄横固不待言，就是在所谓“开元全盛日”，由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撑腰而形成的宦官的政治势力，气焰就很高。《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三卷记载说：“是时（开元十八年），上颇宠任宦官，往往为三品将军，门施荣戟；奉使过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遗，少者不减千缗；由是京城郊畿田园，参半皆宦官矣。杨思勖、高力士尤贵幸，思勖屡将兵征讨，力士常居中侍卫。”同卷十九年又说：“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力士约为兄弟；力士母麦氏卒，伯献等被发受吊，擗踊哭泣，过于己亲。力士娶瀛州吕玄晤女为妻，擢玄晤为少卿，子弟皆王傅。吕氏卒，朝野争致祭，自第至墓，车马不绝。”这些材料虽仅限于宦官，但已足以说明当时一般亲近、贵戚气势的煊赫和政治上的腐败。王维这一时期内，由于个人政治上失意的切身体会，对这种现象是有所认识，同时在作品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前面提到的、当他贬官济州时所写的《济上四贤咏》，就是写官出私门、权贵显赫和志士不平的。他热烈地赞扬了“四

贤”，无情地讽刺了“繁华子”，并显示出社会现实中的阴暗面。“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的崔录事、“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场”的成文学和“著书盈万言”“饮水必清源”的“郑、霍二山人”，都是些很优秀的人物，但他们没有地位，无人提拔，于是，就不得不“解印归田里”，不得不“谢病客游梁”，不得不“老泉石”“安丘樊”了。

这同一主题在《寓言》：“朱绂谁家子？无乃金张孙。骊驹从白马，出入铜龙门。问尔何功德？多承明主恩：斗鸡平乐馆，射雉上林园；曲陌车骑盛，高堂珠翠繁。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诗中还得到了更集中的表现。

除了这样义正辞严、直截了当地抨击了权贵，为怀才不遇的人们叫屈，诗人还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题材的描写，倾泄了这同一思想感情。且以他早年写的《洛阳女儿行》为例。我们初一接触到这个作品，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篇普通的关于贵族妇女生活的写照；但若细加咀嚼，就自会体味出它的深意来。诗说：

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良人玉勒乘骢马，
侍女金盘脍鲤鱼。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簷向；罗
帷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
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春窗曙
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璫；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
薰香坐。城中相识尽繁华，日夜经过赵李家；谁怜越女颜
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

诗中所说的那个花天酒地的青年权贵，虽也“自怜碧玉亲教舞”，但他是不懂得爱情的。诗人同情地写出了一切“洛阳女儿”们“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薰香坐”的苍白空虚生活，同时还更进一步藉“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的感